

Liu Dong De
Cheng Xiang Jie Xian

流动的城乡界线

王建民/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Liu Dong De
Cheng Xiang Jie Xian

流动的城乡界线

王建民/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动的城乡界线 / 王建民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112 - 3028 - 7

I. ①流… II. ①王… III. ①城乡差别—研究—中国
IV. ①D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6398 号

流动的城乡界线

作 者: 王建民 著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钟祥瑜

责任校对: 贾文梅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48 (咨询), 670782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 //book. gmw. cn](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61 千字

印 张: 14. 5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3028 - 7

定 价: 45.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学界一般用“社会转型”或“社会结构转型”概括这一巨变过程。毫无疑问，城乡关系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说，城乡关系的变迁和市场化改革一样，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催生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经济地位。中国社会学对城乡结构、城乡社会流动和农民工等问题的研究，正是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积极回应。

中国社会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的存在，突显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独特面貌。农民工群体周期性的社会流动表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出现一个随着工业化浪潮而来的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过程。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看做城市化的表现，或者说，即便这是一种城市化进程，其路径和欧美国家现代化“先行者”的城市化道路是不同的。众所周知，我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和近十年来的土地财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殊性。

对于改革以来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有很多本土性的概念总结。“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三元社会结构”等概念，便是基于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的理论概括。其实，从农民工群体的角度看，他们“亦农亦工”又“非农非工”，既

不是农村的农民也不是城市的工人，而且他们周期性地往返于城乡之间，不是独立于农民和市民之外的其他群体，因此，无论“二元结构”还是“三元结构”都难以概括城乡关系的新特点。那么，如何对农民工群体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城乡社会结构的特点进行理论总结，就成为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人们常常用来界定中国城乡关系特点的“城乡二元结构”概念，往往将农村与城市看做两个不同的实体，认为二者之间在制度环境、发展水平、社会身份与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成为人们用来衡量城乡关系的习以为常的“认知图式”。其实，在农民工群体社会流动的背景下，有关城乡关系的“二元”判断已经有些不合时宜，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随着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城乡二元结构由“城乡之间”移入“城市之中”，城乡流动非但没有带来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和城乡融合，反而呈现出一条时隐时现的“流动的城乡界线”。

作者结合相关的社会学理论资源和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提出了理解城乡关系的“象征二元结构”概念，即有关农民工群体的身体、空间、话语的社会象征系统及其运作呈现出二元化或两极化特征，进而象征性地表达了城乡之间在社会身份、地位与声望上的二元化与不平等。“象征二元结构”因为农民工群体在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和生活轨迹而得以呈现，因此它是一种流动的、微观的城乡二元结构。“象征二元结构”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它所表达的城乡差别不是经济方面的，也不是制度层面的，而是文化与象征意义上的，它表明了城乡差别在城市中近距离地突显出来。

有关农民工问题的讨论不胜枚举，但像本书这样把农民工现象理解得如此深刻的作品并不多见。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对人们所熟知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了更深入的追问。像社会结构这个概念，但凡有些社会学知识的人都很熟悉，但熟悉未必深知。通常讨论社会结构时，人们的目光一般聚焦在阶层变化、人口流动、权力转型和制度变迁等方面，虽然

这些都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时应当关注的问题，但社会结构不是仅仅通过一些宏观指标便能揭示的现象，还需要考察日常行为以及象征符号这样的微观层面。

从结构化理论的角度看，结构不是外在于行动的客观约束力量，而是在微观的行动过程中形成的，结构与行动往往在实践中交织在一起。由此来看，“象征二元结构”将微观的象征因素与宏观的社会结构整合起来，为我们理解城乡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论视角。此外，“象征二元结构”概念也表明，社会结构往往以感性化的象征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往往为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甚至其不合理的一面也被“认可”，而揭示和解释这种微观的社会结构，或许正是社会结构分析的关键任务。

本书不仅思路清晰、文笔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在现实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启人深思的问题，相信其中的一些论述，将会引起学界同仁更深入的思考。同时，也相信作者本人定能认识到本书的一些观点尚可进一步展开，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更有创见的新作。

刘少杰

2012年2月20日于北京世纪城时雨园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 1
二、背景性概念	/ 3
三、框架与主题	/ 7
四、对象与方法	/ 10
五、研究的意义	/ 12
 第一章 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研究的理论准备	14
一、“象征社会”:社会结构分析的前提范式	/ 14
二、城乡社会结构分析的象征维度	/ 20
三、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相关研究与讨论	/ 23
四、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述评	/ 34
五、总结与讨论	/ 41
 第二章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	44
一、身体的“缺席”、“出场”与中国语境	/ 44

二、农民工身体的社会性与象征性意蕴	/ 49
三、身体的“政治一元化”与“城乡二元化”	/ 56
四、“身体二元化”与农民工身体政治	/ 61
五、总结与讨论	/ 66
第三章 空间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	70
一、社会空间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	/ 70
二、视觉秩序：从农村到“城市里的农村”	/ 76
三、异质空间与城乡象征性界分	/ 82
四、“空间二元化”与农民工“心灵二元化”	/ 90
五、总结与讨论	/ 96
第四章 话语权力与农民工“他者化”形象建构	101
一、大众传媒的农民工话语	/ 101
二、农民工形象建构的文本分析	/ 107
三、农民工形象的“他者化”	/ 129
四、“他者化”的现代性内涵	/ 133
五、总结与讨论	/ 137
第五章 城乡象征二元结构及其现代性意义	140
一、“象征二元结构”的概念谱系与界定	/ 140
二、象征二元结构与社会结构再生产	/ 150
三、象征、国家与现代性建构	/ 155
四、“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	/ 158
五、总结与讨论	/ 163
第六章 “心灵二元结构”与身份政治学	167
一、农民与农民工的“我”：传统与变迁	/ 167

二、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单向他化”	/ 174
三、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裂隙	/ 179
四、城乡流动中国家的“缺席”与“在场”	/ 184
五、总结与讨论	/ 189
第七章 流动的城乡界线:总结与讨论	193
一、基本结论	/ 193
二、宏观结构研究与微观象征研究的关系	/ 198
三、象征因素如何生成并建构社会生活	/ 200
四、“城市融入”还是“流动的城乡界线”	/ 202
参考文献	205
后 记	216

导 论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了全方位和多层次的社会变迁，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转换、政治决策的调整、文化观念的更新乃至心理世界的重构，等等。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中最为明显和根本的莫过于社会结构变迁或曰“社会结构转型”，而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方面是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城乡之间经济关系的调整、社会流动的增长，以及微观的人们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往往都与城乡社会结构转型这一社会事实密切相关。

一、问题的提出

以城乡社会结构转型为主题的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实践的推进而与日俱增。然而，系统地考察这方面卷帙浩繁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从宏观、外在的角度理解城乡社会结构，而微观、“隐秘”层面的分析则相对较少。在我们看来，其重要原因是，人们对社会结构的惯常理解是把它放在与个人和群体相对立的一端，即只在宏观的、系统的角度理解社会结构，而比较微观的社会行动、社会互动、主观意识和象征符号等则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或仅仅顺便提及而没有作为与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加以审视和重视。

另一方面，这也与社会学主流的实证主义倾向密切相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重要理论预设是将社会事实看成客观的、外在的存在，因而可

以用科学的手段加以考察和研究。在这种理性主义方法原则之下，那些宏观的、结构性的社会事实比较容易被客观地加以把握，而微观的、感性的语言活动、身体符号、主观意识等往往被排斥在实证主义原则之外，或仅仅被当成客观之物加以研究。

实际上，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当代社会理论家那里，社会结构不仅是外在的客观社会事实，而且是与社会行动、主观意识等密切交织的实践过程。如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并非仅仅是社会行动的外在模塑力量，它实际是社会行动的结果和行动进一步开展的前提。由是观之，社会结构非但不是外在客观的，它实际上就潜存于社会行动和日常生活之中。而布迪厄同样针砭传统社会学中科学传统与解释传统、宏观倾向与微观倾向以及结构研究与行动研究的二元对立，并在大量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理论命题，如“实践感的模糊逻辑”（the fuzzy logic of practical sense）、“建构主义的结构论”（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与“结构主义的建构论”（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ism）等。

在现实层面，虽然改革以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逐渐扭转了刚性的城乡二元分割格局，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制度隔阂，城乡之间社会身份的区分依然顽固地存在着。在城乡之间迂回徘徊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样态使我们看到，镌刻在人们身份与观念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消失。在一定程度上，随着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城乡界线由“城乡之间”移入“城市之中”，进而突显出“城市中的城乡二元结构”。譬如，就居住空间而言，农民工群体“漂移的社区”与城市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异并非或不仅仅是建筑风格的问题，更是身份与地位的差异问题。“空间”成为一种象征标记，彰显了城乡区分与社会不平等。

结合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与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我们认为，关于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面临一个微观转向问题。具体来说，农民工群体所负载的一系列表征其社会身份的象征标记，如服饰、体态、表情、语

言等身体特征，如居住地及其样式、大小、设施等空间特征应纳入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研究之中。这些象征标记常常成为城市话语（媒介信息、文本框架、社会评判等）加以利用的标签，由此建构对农民工身份的认知与想象。身体、空间、话语等往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区分的结构性力量，这促使我们将微观现象的象征意义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勾连在一起，以期通过对微观现象的分析探寻社会结构转型之势。

从身体、空间、话语等角度分析城乡社会结构变迁，或许可称为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研究的“微观层面”与“人文向度”。所谓微观层面，是强调身体、空间、话语等微观角度有助于我们理解城乡关系的新特点，而宏观的结构分析往往力有不及；人文向度则意谓这些问题往往难以通过量化的方法加以研究，在“动手”之外，还须“用心”。

立足于改革以来乡城社会流动日渐增加的事实，本书试图揭示由农民工群体所负载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微观与象征层面的展现，以及微观象征因素对城乡社会身份的建构、分隔与固化作用。我们试图追问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群体在身体（服饰、体态、表情、语言等）、空间（样式、大小、设施等）、话语（媒介信息、文本框架、社会评判等）等象征层面是如何呈现“城市中的城乡界线”的？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一界线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身份产生怎样的模塑作用？这种呈现与宏观的国家现代性形象的建构有何关联？我们尝试通过提炼“象征二元结构”这一概念对上述问题做出探索性的回答。

二、背景性概念

我们需要简要解释的前提性概念有三：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现代性。其中，现代性是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也是本书的论述语境；社会转型是现代性建构的表现和重要过程；而身体、空间、话语等因素可以被看做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并参与到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如此一来，微观层面的身体、空间、话语等问题便与宏观的社会转型和现代性建构

过程勾连在一起。下面对这三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分而述之。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概念之一，不同研究者往往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其做出不同的理解。^① 但一般认为，“社会结构就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②。诸如学校、政府等都是社会结构的组成单位。这只是对社会结构的一般性理解，在具体的研究中社会结构究竟被如何界定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按照沃特斯（Malcolm Waters）的概括，社会学家们常以社会结构这一术语来描述自己在观察中所发现的模式。这种结构观念存在三种思路：第一种来自建构主义社会学，认为结构是人类有意或无意创造出来的，它被视为一种作为人类行动后果的突生规律性，思维着、行动着的主体被看成结构安排及其内在约束的创造者，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为例证。第二种思路把社会结构看做一个观察者的范畴，一个呈现在社会学家脑海中的概念，是个方法论范畴或分析性范畴，涵括了所有有规律、持久的关系面相，其倡导者是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第三种思路是沃特斯本人所主张的思路，将结构看作潜藏于外在表象之下的决定因素，支撑它的日常社会经验与信念则被当做一种假象，掩盖了位于意识层下的一个真实但却隐秘的实在，而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隐秘的实在。^③

在我们看来，上述关于社会结构观念的三种思路并非互不关联，而是随着研究者的理论立场、研究对象和方法原则的转换而交织在一起，

① 如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把社会结构比拟为人体结构，认为社会就像一个由各种器官和系统构成的生物有机体，并像后者一样存在进化和分化过程。涂尔干（Emile Durkheim）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是具有客观先在性和集体强制性的社会事实，如物质性的国家、教会，非物质性的集体良心、道德风尚等。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只是个形式或名称，它以现实的社会行动为基础而不能独立存在于人们的行动之外。而吉登斯则在结构化的意义上谈论社会结构，认为结构作为被反复组织起来的规则或资源，是社会行动者日常活动的依据，并被后者再生产出来。

② 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③ 参见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01页。

换言之,综合这三种思路或许更有益于揭示和说明问题。因而本书不对三种思路或取向做出单一选择而是综合运用之。在我们的研究中,“城乡社会结构”是本书的核心关注点。这里的“结构”是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有时也被当做“分析性范畴”,而本书对“象征性结构”以及“象征二元结构”概念的运用则更接近上述第三种思路,即试图揭示日常生活中所潜藏的“隐秘的”社会结构。总之,本书侧重于在城乡“实体性”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基础上,揭示其象征性建构的层面。

我们需要阐释的另一个概念是“社会转型”。关于“社会转型”,一些学者给出了大同小异的理解和界定。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性社会向法制性社会转型”。^①有的学者指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等等”。^②而西方论者则以“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为概念工具探究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③

上述对社会转型的理解从总体上表明了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迁以及这种变迁的基本特征。在我们看来,如果将社会转型看做一种实际过程,那么上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的观点,表达了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相对于改革以前以及更为久远的历史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如果

① 叶南客:《边际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②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③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663 ~ 681.

将社会转型作为一种最终方向，那么上述“从……到……”的表述方式则带有明显的目的论色彩。

这种目的论有两个潜在问题：一是把人们的视野引向一个终极目标，而对具体的实践过程和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缺乏关注，因而存在将问题简单化的嫌疑。二是这种目的论也带有“现代化范式”的意味。所谓“现代化范式”，“是一种有着明显的‘思维定式’或‘前见’性功效的未经质疑的有关现代化的规范性信念”。^①例如，有关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和“中产阶级”的理论想象便带有“现代化范式”的色彩，实际上，有关这两方面的现实要比想象中的图景复杂得多。^②

正是出于对“社会转型”这一概念潜在的目的论倾向的警惕，我们认为，有两点分析较为必要：第一，在方法论层面，社会转型是一种“理性类型”（ideal type）意义上的概念工具，它有助于我们审视和对比中国社会改革前后的历史与社会变迁，至于如何“转”、“转”向何处，则难以在实践中找到明确的对应之项。第二，社会转型是个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的过程，其中夹杂着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惯习、资源分配与利益冲突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强调这两点对本书的意义在于，我们将社会转型看作复杂的过程，它并非简单地“从……到……”式的跨越，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纠结在一起。对于普通的社会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来说，社会转型也是一个充满利益摩擦和生存考验的挑战，对他们的生存状况给予应有的关注，同样是社会转型研究的必要之举。

“现代性”是我们需要阐释的第三个概念。那么，何为“现代性”？在总体上可以认为，“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

①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0页。

② 中国社会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不同的，比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力量并没有催生出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就城市化来说，中国社会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存在，使我国的城市化道路更显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解释或想象中国的现实往往是行不通的。

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的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①“指向美好未来的价值追求是现代性的核心，或曰现代社会的‘精神内核’”。^②这是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对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的一种理解^③，当然，这一观点只是就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而言成立。但一些西方国家往往把它作为完美的模式推广甚至强加给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作为欧美现代性的“他者”——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出于摆脱“后发劣势”和追求“现代形象”的渴望，无意识地接受了这种现代性的话语模式。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类学家罗丽莎（Louisa Schein）的观点富有启发性。她认为，“现代性”持续地作为一种想象而存在，作为一个打造全球/本土的主张、许诺和知识的不断转移的场所而存在，作为话语实践、语言、比喻而交替存在。正因为如此，“现代性”常常被民族国家用来组织其整体和“现代”形象。^④事实上，性别、阶级、权力、地域等因素的参与决定了现代性项目的复杂性，也决定了西方中心的现代性模式或民族国家对现代性单一性的、理想化的承诺都大有问题。本书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建构”、“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的内容便深受这一观点的启发。

三、框架与主题

本书分七章展开以下内容。其中第一章为理论准备与争辩部分，第

① 余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页。

② 参见王建民：《现代性在中国：建构与反思》，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06年9月25日。

③ 当然，对西方现代性还有其他不同的理解。这里感谢郑莉博士提示我后现代性视角下的现代性分析，即作为历史时间的“现代”概念与作为问题的“现代性”概念是不同的，虽然作为历史时间的现代概念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但作为问题的现代性则是在后现代话语中流行的。参见郑莉：《后现代语境下的现代性问题》，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06年9月25日。

④ 参见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黄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第13页。

二、三、四章具体回答导论所提出的问题，第五章对前文的分析进行理论总结，第六章对第五章的内容做进一步思考，第七章为结论和讨论部分。

在第一章中，我们首先提出城乡社会结构分析的前提范式和城乡结构转型研究的象征维度。接下来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与梳理，并对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在本章中，我们主要指出以往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研究对微观与象征层面社会结构的忽视，也缺少对“城市中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揭示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象征社会”的分析视角，以指出和强调社会结构分析的微观与象征维度，抑或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研究的微观转向问题。

在第二章中，我们认为，以服饰、语言、体态、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历来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具体到城乡社会结构上，农民工群体将一系列表征农村社会文化的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进而使“城市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出现。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身体呈现，彰显了农村与城市之间、城乡社会身份之间的区隔甚至不平等。

第三章主要讨论空间问题。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社会空间转变的过程。改革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使社会空间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这一现象随着改革的推进而渐趋弱化，社会空间经历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然而，城乡之间的制度与身份差异、发展起点与速度的差距又催生了社会空间的“再政治化”。这种“再政治化”的重要表现是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群体在生活空间的占有能力、占有机会以及占有数量上的不平等。本章区分了“飞机场式”与“火车站式”两种城乡空间的分隔形式，前者表达一种外在显性的空间二元分隔，后者则预示了内在隐秘的空间二元界分。

如果说第二、三章是就农民工群体本身来分析的话，第四章则关注外在的大众传媒与文本框架对农民工群体社会身份的建构性实践。媒